



科举 制度与 近代 文化

杨齐福 著

人民
出版社

科举
制度
近
世

杨齐福 著

人
民

社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杨齐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

ISBN 7-01-003934-8

I. 科… II. 杨… III. 科举制度-关系-文化-中国-近代
IV. 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262 号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KEJU ZHIDU YU JINDAI WENHUA

杨齐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194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3934-8 定价:1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近代社会转型与科举制度危机	(14)
第一节 近代社会的转型	(14)
第二节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危机	(18)
第二章 近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废除	(32)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科举改革思想的酝酿	(32)
第二节 太平天国时期科举改革活动	(36)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	(38)
第四节 戊戌变法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	(51)
第五节 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废除	(63)
第三章 传教士与近代科举制度改革	(77)
第一节 传教士对科举教育的批判与对科举 制度的反思	(77)
第二节 传教士在华活动对科举改革的影响	(99)

第四章 新观念的生成及其对科举制度

的冲击..... (128)

第一节 近代人才观的演变及其对科举制度 的冲击 (129)

第二节 近代教育观的蜕变及其对科举制度 的冲击 (149)

第三节 文化心态的转换及其对科举制度的 冲击 (173)

第四节 学术风尚的转移及其对科举制度的 冲击 (193)

第五章 近代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终结 (212)

第一节 新式学校的产生及其与科举的斗争 (212)

第二节 书院改革的兴起及其与科举的剥离 (236)

第三节 留学教育的崛起及其对科举的瓦解 (248)

第六章 余论..... (260)

第一节 废科举于“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 之效” (260)

第二节 清末科举制度的残余形态 (271)

参考书目 (290)

导 论

公元 598 年隋文帝“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是科举制度的萌芽。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设立^①。科举制度虽创

- ① 科举制度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一个学术界长期有争论的话题,其因在于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特征有异议。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邓嗣禹以考试制度和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制度起源的标志提出科举制度始于隋,而俞大刚则以士子投牒自进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认为科举制度始于唐。尔后,一大批国内外学者也都主张科举制度始于隋。近年来一些学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黄留珠认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不仅是科举制度与察举制的根本区别,也是科举制度与其他入仕杂途的根本区别,因此他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设进士科。阎步克则认为“由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是科举与察举的根本区别,隋朝进士科没有自由报名这种形式,在形式上仍属察举科目而非科举科目,所以进士科始于隋而科举制则确立于唐。金铮认为科举制度正式产生是在唐代而不是隋代。何忠礼经过多方论证,认为史书中记载进士科始于隋的说法查无实据,且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际实行的是察举制,士子投牒自进正式出现在唐代,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唐代而不是隋朝。徐连达、楼劲却认为科举提出“汉代实为科举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隋代说在国内史学界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并贯彻于大中小学教科书。(参阅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民国考试院 1936 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立于隋,但盛行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明清,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并与君主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官员铨选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与教育紧密相连的考试制度^①。

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统治者在人才选拔机制上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西周的世袭世禄制到秦朝的军功封爵制、两汉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士大夫都世代享有官职与俸禄的特权。这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它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入仕途径,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僵化。春秋战国时,各国招贤养士之风盛行,世袭世禄制受到严重冲击。秦朝实行军功封爵制,废除了死袭世禄制。汉初,封建政权以军功贵族为主,缺少经邦治国之士,而官僚机构的运作亟需各种人才,于是汉代建立了以察举制为核心的选人

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第二期。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 ① 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与小农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产物。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后期大家族田庄的瓦解与个体家庭经济的普及,是科举制度出现的经济原因。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是零散、琐碎,蕴涵着平均主义的自由竞争精神。而科举制度不仅在基本精神上与之完全合拍,而且在发展程度上也与之完全同步。它是与知识阶层下层要求政治地位的欲望相适应的。这些人既无家世可以炫耀,又无特权可以依恃,因此他们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参与政权。实际上,科举制度正是他们的发明,而不是专制统治者的创造。(参阅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制度,并附之征辟、贤选等形式^①。这些途径为两汉官僚政权解决了人才选拔的问题,但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因察举重在以道德评判,而道德的标准是很难以客观、公正、划一的尺度去衡量、验证的,这就造成举主任人惟亲、鱼目混珠,被举者矫情造作、欺世盗名。“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②。到了东汉末年,这种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两汉察举制遂被魏晋九品中正制取代。曹魏政权首创九品中正制,“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④这种由政府官员与民间人士共同评定以荐举职官的做法,似乎比出于一人之意的察举要少一点随意性。因此,“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⑤但后来门阀世族控制了选官制度,遂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成了世袭制的翻版,科举制遂应运而生。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方式,凭文取人,使人才选拔有了客观的标准和衡量的依据,也使选官用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可以说是中国选举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邵作舟在

① 察举就是由三公九卿、郡守之流“择吏民之贤者”,荐于朝廷,这是当时选官与入仕的主要途径。此外,皇帝直接聘人做官谓之“征”,长官任用僚属谓之“辟”。同时人们还可以向政府纳粟若干,自备车马行装到长安听候朝廷选用,时称“贤选”。

② 《苏轼文集》(第二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724页。

③ 《抱朴子·审举》。

④ 《资治通鉴》(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2178页。

⑤ 《晋书》(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8页。

评述历代选举之法时曾高度评价科举制度。他说：“夫先王庠序经诵教养之美，既不复施于后世，而乡举里选公卿荐辟之法，又适以便奔竞浮躁之徒，然则上之进退黜徙，独有以示天下之公者，科举之一途而已。”^① 顾颉刚则说：“隋代一统，……废九品而创进士科。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亦益均，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独立发展，蔚为盛典，盖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②。吕思勉也说：“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九品中正制无论矣，即汉世郡国选举得之者，亦多能奔走标榜之人，……惟科目听其投牒，而试之以一日之短长，当其初行时，尚无糊名易书之法，主司固得采取誉望，士子亦得托人荐达，或竟自以文字投谒。究之京城距士子之乡土远，试者与所试者关系不深，而輶轳之下，众目昭彰，拔取苟或不公，又可加以复试，亦不敢显然舞弊。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投牒自列，即不得不就而试之，应试者虽不必其皆见取，然终必于其中取出若干人。是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循私舞弊之限制，而亦人人有服官之权之所以兑现于实也。”^③

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中国古代用人选拔制度一次重大飞跃，其进步性体现在科举的平

① 邵作舟：《邵氏危言》卷下，商务印书馆 1898 年，第 4 页。

② 顾颉刚：《中国考试制度史·顾序》，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 1936 年。

③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第 731 页。

民化效果,即科举的开放性、公正性^①。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考、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考生几乎没有身份、阶层、职业等限制,除了倡、优、隶、卒等“贱民”外其他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反映了科举的开放性特征^②。科举制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机会,体现出一种平等精神。为了确保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科举取士本着“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公开竞争,择优录取;为了确保这种竞争的公正,科举考试有着一整套详尽而又严密的规则,以防止越轨行为,如锁院以防漏题、搜检以防夹带、监考以防偷看、糊名誉录以防关节、内外廉之隔以防串通作弊、场后复试以防冒名顶替、考官回避制度以防徇私舞弊。科举制在形式上的平等、公正制造出一个“空前伟大”的烟幕弹,给每一“田舍郎”以“暮登天天堂”的幻想,为草野寒贱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消解了社会内部的张力,适合于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因此它能超越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并存在上千年。

科举制度在形式上标榜“惟才是举”,注重机会均等,强调公正、平等,这与西方的贵族等级制、政党分肥制相比,“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入仕途的现象,

① 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第 11 页。

② 据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统计,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而明清两代进士中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者占 42.9%,这进而说明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特征。

在最善的本意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①。所以美国学者顾立雅(H.G.Creel)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le)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崔瑞德(Dennis Twitchett)也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历代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也指出,一般的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贡献,无非是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而实际上比这些物质发明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它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选官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②。英法美等国正是借鉴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内核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同是科举,作为舶来品移植于西方土壤上,变为一种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物种,而在中国却成为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乃至衰败的祸源之一。因为科举制作为支撑封建官僚政治的杠杆和调节器,有效地制衡并调节着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其尊经义、重文辞与轻自然、斥技艺的特点又导致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乃至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台湾)幼狮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第196页。

② 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①这也是对科举制度在中国命运形象而又精辟的论述。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败,科举制度也败相丛生,特别是明清时八股取士,摧残人才,钳制思想,祸害尤烈;纲纪败坏,作弊成风,科场案层出不穷。这表明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在前近代社会就已消磨殆尽。

当历史翻开近代一页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转型,政治改革大潮涌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欧风美雨劲吹,这样科举制度因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而在近代发生严重的危机,终于在封建制度行将就木之前便告终寝。

二

有关清代科举制度问题的研究,前人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国内如末科探花商衍鎤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该书征引多种史籍并参考了各类杂志和私家记录,还融进了个人应试的经历,对科举考试中的各个方面内容都作了详细介绍,内容丰富,考订周密,源流毕见,因而为中外治科举制度学者所称颂。^②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则对科举制度在清代的嬗变以及清代的科举教育、民风士习作了详细研究,还着重阐释了科举制度在清季的因革损益及废止的过程与原因^③。宋元强的《清朝状元》则是一部研究清

① 雨果:《笑面人》,转引自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第 369—370 页。

②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 1958 年。

③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84 年。

代状元的专著。它介绍了清代科举的概况,并开列了有清一代 112 科状元的姓名及其履历,状元的地域分布、家世游学、政事德行、著述学识等方面也作了探讨^①。此外,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沈兼士的《中国考试制度史》等著作也涉及到清代科举。海外研究清代科举的代表作是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此书是海外学人研究科举制度最详尽也最有价值的著作^②。

科举制度在近代结束了它上千年的历史,这里既有内在的原因如考试内容的空疏等,也有外部的因素如西学的传播等。王德昭在《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科举考试,在实行的制度上历代虽有因革损益,然清承明制,即以清代所实施的制度而言,行之也有五六百年,则其卒遭废止,其历史意义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的影响的重大,可以想见。”并指出“清政府之认真考虑变通科举,乃在海禁开后,西潮迫来,国家处境大变,新时势要求新人才,而新人才的作育要求新教育。传统的科举考试既无以应新时势的要求,于是新学校建立,卒至取明、清两代行之已百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而代之。”^③ 刘海峰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认为,“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发展到相当完备程度,但是,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被动地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科举考试的内容

① 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

②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3.

③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166 页。

与社会实际需要日益不相适应。尽管清代统治者多次图谋改革科举,但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科举不得不走完其漫长的历程,变为历史陈迹。”^①何怀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分析了选举社会内在的矛盾和困境,以及西方冲击给晚清社会带来了新形势、新问题,从而最终导致科举制度的终结^②。傅吾康在《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在近代是如何走向衰落并认真分析了其原因,指出西方文化的冲击是科举制度终结的重要原因。沈其新将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基本原因”;“其次,广泛兴办的新式学堂是科举制度寿终的直接原因”;“再次,日趋没落的书院制度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止”;“最后,社会心理的变迁,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消亡”^③。郑焱认为鸦片战争后人们多次试图改革科举制度,然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成,清末新政使得社会再次提出废除科举要求,而此时清政府权力的变动、新教育思潮的兴起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使得废科举的各项社会条件日益成熟,遂于1905年废除科举^④。

尽管有关科举制度衰亡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大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与现象的分析,从文化角度切入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文化是社会的灵魂,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一种新文化。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作为一

①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②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第三编,三联书店1998年。

③ 沈其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广州研究》1987年第11期。

④ 郑焱:《一九〇五年废科举论》,《史学月刊》1989年第六期。

种文化现象,它必然地与近代文化发生内在的联系。这是缘于近代文化不但影响着科举改革的进程,而且规定了科举改革的内容,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并最终促使科举制度的覆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探究科举制度的衰亡。

本书尝试从文化史角度入手,把科举制度的衰亡放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中,以近代文化的发展为内在理路,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与消亡为研究线索,认真考察科举制度变革的历程,深入探讨近代文化对科举制度的影响,进而开拓科举研究的视野,深化科举领域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设想,本书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近代社会的变迁对科举制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二)人们在近代是如何认识科举制度的?这些认识是否切合实际?人们对科举变革提出哪些主张?这些主张有多少付诸实施?(三)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近代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科举制度造成怎样的影响?(四)近代新教育体系的生成给科举制度造成多大的冲击?

本书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近代社会转型与科举制度的危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跨出封闭的传统社会,走进开放的近代社会。近代社会转型标志着社会的改组与重建,宣告一个变革时代的到来。依附并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由于无法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需要,遭到剧烈重创,发生了全面的危机。

第二部分是“近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废除”。由于科举制度与近代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变革科举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变革主张。经世派主张废八股,试策论,尤其是魏源首倡以西学取士,超越了传统,初露时代

的亮色;太平天国革命者则身体力行,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具有农民革命特色的取士制度;洋务派提出特开算学科或另设洋务一科的建议,肯定了西学在科举中的地位;维新派则强烈要求废八股,考西学,合学校与科举为一体,凸显了西学取士的取向。科举制度在近代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终于在20世纪初被废除。

第三部分是“传教士与近代科举制度改革”。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卷土重来。他们借西学以辅教,热心于在华兴学校、办报纸、建学会。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及其对新教育的示范,促进了传统教育观念的蜕变,为科举变革作好了必要的思想铺垫。传教士还大力抨击科举制度,提出变革科举主张,丰富了近代科举改革的思想。

第四部分是“近代新观念的生成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西学东渐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动。人才观在近代与时俱进,从皓首穷经、热衷于功名的传统人,向趋重于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并掌握专门知识的近代人才转变。教育观在近代也经历了新旧观念的转换,从以八股时文为中心的科举教育转向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国民教育,近代教育思想蔚成风气。与此同时,士人积极汲取西学,竞相从事新兴职业,科举功名在人心目中日轻,则反映了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经世之学的崛起与经古之学的复兴,挤迫了八股之学的生存空间;而西方新学的涌入,剥夺了八股之学的话语霸权,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根基。近代新观念的生成导致科举制度思想支柱的塌落,从而最终埋葬科举制。

第五部分是“近代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衰亡”。近代新学校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加剧了与科举制间的矛盾,使科举改革显得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又为科举制创造了替代物。书院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它在近代经过一系列改革后从科举制中剥离出来,注重新知识的传授,重视新人才的培养,对科举改革起到促动作用。而留学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为近代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对科举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第六部分是“余论”。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促使国人思想的解放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瓦解,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尽管科举制度通过清政府一纸诏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但并没有在制度上予以彻底根除,而是留下一条长长的科举尾巴,这便是科举制度的残余。

由于近代文化内容的广博与形式的多样,它对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譬如近代国人对科举制度的认识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对科举改革进程产生的怎样影响?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有何作用?这就给本课题的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使得研究课题的涉及面更广,头绪更复杂。

为此,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入挖掘史料,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式,运用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纵向考察科举变革的历程,从横向探究科举衰亡的文化因素,力求宏观论证与微观阐释相统一。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透视科举制